



西方汉学家视野中的六朝历史考古

——丁爱博《六朝文明》导读



李梅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六朝文明》(Six Dynasties Civilization)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丁爱博(Albert E. Dien)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历史考古学的代表作,是张光直教授主编的《早期中国文明系列》之一,2007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即将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刊行。

丁爱博早年就读于华盛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学和研究方向包括中国历史与语言、内亚(Inner Asia)历史与文化,尤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主要研究领域,撰有多篇关于中古政治与社会、军事、文物考古方面的论文,《六朝文明》是他积三十年之功完成的一部魏晋南北朝历史考古学代表作。丁爱博教授1993年自斯坦福大学荣休后,仍专注于六朝的研究,目前正致力于“剑桥中国史”丛书第二卷之《六朝史》及《六朝文献指南》的编撰工作。

魏晋南北朝(即西方学者所称的“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混乱与无序的年代,永嘉之乱后,“五胡乱华”带来了政治格局的频繁异动,社会与经济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有些西方学者将这段历史与欧洲中世纪历史相提并论,称之为中国的“黑暗时期”。其实,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但不“黑暗”,反而在文化、艺术、技术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开启了灿烂的隋唐文化之先河。

在六朝三百多年的岁月里,经历了政治分裂、地区战乱、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民族融合、外来宗教与文化的渗透等一系列的重大社会变迁,如何撰写这个特殊时期的物质文化史,无论对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来说都非易事。在以文献为主要研究材料的传统史学里,对制度史和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视长期主导着历史学的研究方向,而对涉及更广泛社会

层面的物质文化缺乏应有的关注,至少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随着考古实物材料的增加,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尝试以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式复原六朝的物质文化,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考古所获的实物资料仍然只是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辅助,考古学家常常不自觉地将考古材料作为重大历史学题材(如礼仪制度、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实物证据,因此十分重视与精英阶层相关的都城、墓葬及文字材料,而忽视了更丰富和生动的体现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实物材料。考古发现的实物包罗万象,与传世文献相比,不但内容更丰富,也能更真实地反映古代社会的原貌,因此,在复原古代社会与文化方面,历史考古学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体现更强的活力。美国汉学家丁爱博教授的《六朝文明》依据实物材料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了六朝的社会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极好范例。

丁爱博的学术背景涉及六朝历史学、考古学和艺术史,他对六朝的研究既有政治制度史方面的宏观关注,如对六朝政权与社会变迁所作的论述,也有对六朝个别文物的微观考察,如对堆塑罐、镇墓俑、马蹬、武器等的讨论,对六朝文化史重要文献也多有研究。正是在这些前期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丁爱博得以完成这部视野开阔,又不乏深度的六朝历史考古学专著。

《六朝文明》的内容和叙述方式与谢弗(Edward Schafer)的唐研究著作相仿,它也许可以与谢弗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的舶来品研究》媲美,成为六朝研究方面的经典之作。

在丁爱博看来,六朝尽管经历着社会的巨变,但人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具有基本的延续性,社会的变迁引起了物质文化的变化,但绝不是对过去的断然割裂,六朝文化在汉代基础上持续发展,并开启

了隋唐文化成就之先河,因此,他从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变迁中的六朝文明,“发展”与“变迁”就是《六朝文明》的两大主题。

围绕着六朝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特质,《六朝文明》依据考古出土的实物材料,结合历史文献,对六朝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全书除前言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十三章:

第一章“六朝”、第二章“城市与边镇”、第三章“建筑”、第四章“墓葬建筑”、第五章“皇室墓葬”、第六章“墓内陈设”、第七章“物质文化与艺术”、第八章“家具”、第九章“服饰”、第十章“铠甲和武器”、第十一章“音乐和乐器”、第十二章“日常生活”、第十三章“佛教与道教”。

这些章节的划分显然与中国考古学著作常见的分类有较大不同,除了包括中国考古学比较重视的内容如城址、建筑(二、三章)、墓葬(四、五、六章)、手工业(七章)、宗教(十三章)外,还对反映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状态的物质文化(八至十二章)进行了十分详细的论述,这反映了西方学者不同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思想。

一、六朝的政治特性与社会特质

《六朝文明》的开篇第一章和结语部分都是对六朝的总括,前后呼应而各有侧重。第一章是对六朝历史的概述,但并非简单的史实罗列,而是从“自然平衡(natural equilibrium)”的角度分析了六朝的政治特性和社会特质。他认为,尽管在220年到1912年间,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时期相差无几,六朝更是一个以分裂为主的年代,但全国统一的趋势始终贯穿于中国的历史。他认为至少从秦汉开始,自然平衡就成为国家统一的动因,秦汉建立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典范,六朝社会虽然看似支离破碎,但统一一直是六朝历史发展的主线,分裂只是重归统一之前的短暂过渡,这与印度的情况正好相反,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在以胡人为主体的北方和以中原移民精英为主体的南方政权都是如此,只不过由于南北方居民成分的不同,而导致了南北方政权特征的差异。

那么什么样的自然平衡才是六朝社会的统一动因?丁爱博认为,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消灭了以权力世袭为特征的血缘贵族和血缘意义上的高等级宗族,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精英、世家大族组成的官僚体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都没有了权力的自然集中,所以每一次的分裂都是暂时的,最终

会实现国家的统一。

非汉民族的南迁和政治的分裂无疑是六朝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丁爱博承认非汉民族的出现对六朝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但反对中国历史学家过份强调非汉民族与中原民族的融合进程,认为文化的融合不仅发生在非汉民族与中原民族之间,也发生在南方,即南迁的北方人与本地人之间,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借鉴和利用,而不是对原本价值观的取代,因此他强调六朝物质文化的地域差异,而不是种族差异。

丁爱博对于六朝文化的理解是非常正确的。陈寅恪先生曾多次强调中古时期的文化与种族问题,如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种族之关系较轻,所谓有教无类者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又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凡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丁爱博关于种族与文化的讨论可以说是对陈寅恪观点的实物阐释,相比陈寅恪先生所依据的文献资料而言,考古提供的实物材料有着更广泛的代表性。

六朝考古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物质文化的地域差异,而非种族差异。地域差异首先表现在南北文化的差异,其次是北朝内部各地域之间的差异。在各主要政治中心地区,如平城、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及辽西和河西重镇等,尽管统治者的种族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中原式的礼仪典章制度,即便在十六国时期“戎狄居半”的关中地区,物质文化也显然是汉传统的延续。以丧葬礼制为例,从墓葬形制到随葬品和图像基本上都是汉、晋传统的延续,很难根据丧葬礼俗来推断墓主人的种族。在一些身份明确的少数民族贵族墓(如平城鲜卑贵族墓),以及外国人的墓葬里(如西安等地的粟特人墓),尽管保留了一部分民族旧俗,但墓葬的主流文化因素,如关中地区天井式的墓道、门楼式的墓门和体现中原卤簿制度的陶俑组合等,明显是中原传统的延续。雁北河套地区和平城地区作为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前的早期活动中心,考古材料体现出“华夷糅杂”的文化面貌,但以方山永固陵、司马金龙墓等为代表的一批鲜卑和汉人高等级墓葬反映的都是中原式的礼仪制度。

关于地域文化差异与融合的思想贯穿于《六朝文明》全书,作者在论述城市、建筑、埋葬方式,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方面,都十分注意地域之间的比较,强调地域之间的差异与交流,并在结语部分对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作出了总结性论述。他指出,非汉游牧民族对六朝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服饰(如袴褶)、饮食(如奶制品)、马背乘骑方式(马蹬)、梯形棺木、镇墓兽的样式、妇女地位等方面。此外,中亚文化和佛教等外来文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六朝的社会。他以墓葬壁画和传世绘画中的图像为例,详细讨论了外来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以及南北方所受不同程度的影响。

政治格局的多变性、民族成分的复杂性、人口流动的频繁性、文化交流的多样性是形成六朝地域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正是六朝地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促成了汉、唐文化的嬗变。六朝,只是汉唐之间的一个短暂过渡时期,丁爱博在本书的楔子里以圣经故事引出了六朝社会的这个重要特征:

As Adam and Eve were fleeing the Garden of Eden, one version goes, Adam turned to comfort his sobbing mate. "Don't cry, dear," he reassured her, "We're just living in an age of transition." (当亚当和夏娃逃离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安慰哭泣中的伴侣。“别哭,亲爱的”他鼓励说,“一切都是暂时的”。)

二、六朝的城市与建筑

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共同关注的课题,但由于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同样残缺不全,很难对任何一座古代城市作出理想的复原。《六朝文明》以考古发现讨论了城市的平面规划与布局,以文献资料勾画了城市的细节和城市生活,研究方法上较好地文献与考古资料进行了结合,再现了六朝时期的部分城市面貌。

《六朝文明》第二章“城市与边镇”相当于中国考古学传统分类中的“城址”,系统讨论了南北方的多个城市,包括北方边镇(北魏六镇之武川、抚冥、柔玄及赫连夏之统万城)、北方早期城市(如邺城、晋阳城、寻阳城)、北魏都城(盛乐、平城、洛阳)、南方城市(武昌、扬州、建康),对资料相对丰富的邺城、平城、洛阳和建康的讨论最为详细。

六朝是中国古代城市大发展的时期,城市规划的很多方面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唐长安城及以前、宋汴梁城及以后),那么六朝就是前一个阶段城

市形态的基本定型时期,主要特征是里坊制的形成。新的里坊制在北魏洛阳城已有明确形态,但其来源可能渊源于曹魏邺城,也可能受到北魏平城“邑居”制度的影响,只不过考古材料过于稀少,文献记载也语焉不详,无法得出更明确的发展轨迹。六朝城市的另一个特征是主要宫殿和衙署的集中和北置,一改西汉长安城和东汉洛阳城宫殿的分散状态,这可能反映了城市居民的增多和城市防卫功能的强化。无论封闭的里坊制还是宫殿在城市中的绝对地位,都反映了古代城市强烈的皇权意识,这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尤其是六朝隋唐城市)与欧洲中古城市本质上的不同,正如20世纪最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欧洲中古城市本质上是依赖工商业发展起来的市场聚落,而中国城市往往只是官府所在地或皇权代理人的治所。韦伯对中国城市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但他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缺乏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具体分析,丁爱博作为一位熟知中国历史、熟悉中国文献与考古材料的西方学者,对六朝城市的特质有着非常准确的理解,遗憾的是他在本书中并未将六朝城市与欧洲中古城市作出比较。

丁爱博对六朝城市的讨论包括城市建设史、城市规划与建筑技术的发展、城市经济与社会等内容,与中国学者重视城市的平面布局、重视宫殿与宗教建筑有所不同,他较重视城市的细节,常常利用文献资料生动地描绘城市的真实生活状态,从城市居民的生活图景探讨了城市的文化因素。如通过《南齐书》记载的平城祭祀场景,讨论了平城城市生活中的游牧民族因素,以及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印象;又如以刘宋孝武帝讨伐竟陵王刘诞的史实,描绘了攻城战中广陵城内的城楼、烽火台等设施,根据南朝王朝的兴衰描述了建康城的兴建历程,从侯景之乱等重要历史事件描绘了城市建筑的诸多细节。丁爱博对南方城市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地形、资源等因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如从地形和资源因素讨论了东吴武昌城的兴衰:良好的地形屏障和丰富的铜矿资源决定了武昌城在东吴早期的地位,而本地农产品的匮乏则成为战争时期武昌城的先天缺陷,最终导致了武昌城的衰落和建邺城的兴起。

对与六朝城市史关系密切的建筑,丁爱博有着更深刻的论述。本书的第三章主要基于壁画和画像砖中的建筑图像、墓葬中的建筑模型等资料,结合文献对六朝的建筑进行了讨论。

六朝考古中的建筑资料远不如汉代丰富,也缺

乏汉代祠堂、阙及楼阁模型等反映的建筑物细部特征,但丁爱博注意到不同类别的建筑实物资料与真实建筑物的差距,如石刻中的建筑和平面图像中的建筑在反映实际建筑上的不同,因此他对六朝建筑基本特征的描述是十分谨慎的。在建筑物的分类上,他认为宗教建筑和世俗建筑在结构上没什么区别,功能上有时也能混同,所以他主要从建筑的结构上将六朝建筑分为三类:有承重墙、无斗拱的普通建筑,以穿斗和抬梁方式组成柱网的大型木构建筑,佛塔建筑。对三类建筑的讨论都是基于考古发现的实物,因此对材料相对丰富的大型木构建筑的论述最为详细,不但讨论了斗拱、梁柱、鸱吻等建筑元素的发展轨迹及在建筑中的作用,也比较了屋顶支撑方式与西方建筑的差异,还将壁画中的建筑图像与文献中描绘的宫殿建筑进行了对比。

丁爱博认为包括六朝在内的中国古代建筑主要是根据一定的梁柱结构原则而建造的木构建筑,因此建筑上的变化相对有限,建筑风格相对保守;但也正是在六朝时期,一些典型的中国建筑特质开始出现,如愈加固守木构传统、愈加强调屋顶、开始加大屋檐的进深、斗拱更加复杂、简朴的汉式风格向华丽的装饰风格过渡等。

三、六朝的墓葬文化

墓葬是历史时期考古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类实物材料,它对复原古代社会的作用早已超越了丧葬礼制上的意义,由于墓葬材料所覆盖的时空范围非常广泛且内涵丰富,完全可以以此重建某一时期或地区的文化史。与很多西方学者将墓葬视为艺术史材料不同,丁爱博更像多数中国考古学家一样,将墓葬视为一类非常重要的文化史材料,没有对墓葬礼仪空间或“墓葬观念”做过多的阐释,而是按地区讨论墓葬建筑的地域性特征(第四章)、按时代讨论皇室墓葬的演变(第五章)、按墓内物品的类别讨论了各类物品在时空上的变化及可能的象征意义(第六章),这样的论述方式与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常见的分区、分期、分等级相似,目的是探讨墓葬文化因素的渊源、交流和融合,从而复原局部的物质文化史。在材料零散、地域特征为主的六朝墓葬中,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叙述方式。

第四章是关于六朝墓葬形制与结构的讨论,正如章名“墓葬建筑”所示,丁爱博将墓葬视为一类建筑实物,因此对墓葬的关注并不仅仅在于墓葬的平面和立体形态,而是充分考虑到建筑技术与地理环

境、文化传统的相互影响,以及与地面人居建筑在技术和涵义上的区别与联系。本章将六朝墓葬分为北方和南方两部分,将北方墓葬分为中原、西北和东北三个区域,将南方墓葬分为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及南方其他省区共10个小区,每部分都详细介绍了墓葬的发现情况,再以典型墓葬为例介绍墓葬形制在本地的发展演变情况。丁爱博认为,六朝墓葬建筑的主流文化因素来源于汉,但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而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总的来说,六朝墓葬的主要发展趋势是:穹隆顶结构和玉带式砌砖方式的广泛运用、分段式墓葬的减少,以及凸字形墓的增大,但不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差异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福建等地的阶梯递进式墓葬,广东地区的船篷形墓和多连墓。

墓葬之所以成为物质文化史的重要材料,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直观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丧葬礼制,而丧葬礼制往往在政治中心地区的高等级埋葬实践中得到最好的执行,因此丁爱博在第五章专门讨论了皇室墓葬的发展情况。对皇室墓葬制度的讨论始于汉而终于隋,表明作者重视对六朝丧葬礼制的追根溯源。他认为,尽管六朝的埋葬模式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从地面设施到地下空间,基本上是汉代传统的延续,六朝墓葬体现的主要是汉唐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

丁爱博将六朝的皇室墓葬分为三国、西晋和南北朝三个阶段,南北朝时期则按南方和北方分述,这样的时空划分基本符合魏晋南北朝墓葬发展的基本特征:从时间上,六朝丧葬模式经过了曹魏、西晋和南北朝几个阶段;从空间上,六朝丧葬模式主要体现在南北方之别。

曹魏和西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丧葬模式大变革的时期,一个具体表现是所谓“薄葬”,即相对汉代墓葬而言的简化,薄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正如丁爱博所说,埋葬简化的原因极有可能是由于现实的经济状况,而不是由于朝廷的政令。他认为曹魏西晋丧葬模式的另一个变化是对祖先崇拜的关注由墓葬转向宗庙,这种现象肇始于东汉时期地面附属建筑的衰退,三国时期曹丕又主张恢复宗庙祭祀的旧制而废除墓祭。在薄葬和不墓祭的影响下,曹魏、西晋皇室墓葬地面和地下的配置都大大地简省了,如地面上不树不封、不立寝殿,地下部分墓室数目减少、随葬品缺乏金银珠玉等珍贵品,原来标识墓主身份的墓碑也转入地下成为墓志等等。正是由于曹魏和西晋埋葬制度上的这些变化,我们现在很

难像对待汉代帝陵一样,将文献记载的帝陵与今天的考古发现进行明确的对应,丁爱博除对身份较为明确的皇室陵墓进行详细描述外,也对一些墓主身份存疑的陵墓进行了推测。

由于六朝墓葬的地面设施十分简略(仅有南方六朝帝陵的神道石刻),因此丁爱博在论述墓葬文化的时空分布之后,重点讨论了墓葬的地下部分——墓内陈设(第六章),相当于中国考古学著作中的葬具和随葬品。他将这部分内容分为:墓内设施(棺槨、帷帐、祭台、墓志等)、避邪及象征物(镇墓兽和俑、玉猪、弩机、魂瓶、镜子)、日用器和明器。

在讨论墓内设施时,丁爱博常根据统计数据来考察墓葬文化因素的地区特征,如通过对棺钉发现地点的统计得出棺钉并非木棺唯一扣合方式的结论,又认为梯形木棺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而佛教中国化之后又成为佛教舍利函的形制,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结论。但他因墓内祭台(放置灯盏的砖台)大多发现于长江流域的现象而推测它是为了防潮而作,其实祭台这类墓内设施主要体现的是丧葬礼制方面问题,似乎更应根据墓葬等级而不是根据地区分布来做统计,否则可能会忽视这些文化因素在礼制方面的意义。

丁爱博所称“祭台”即墓室内高出地面的放置献祭物品的砖台,它的所处位置往往代表了墓室内的祭祀空间,即便在没有这种砖台式祭台的北方墓葬中,祭祀空间也是存在的。在东汉以后流行的前堂后室式墓中,前堂往往是摆放献祭物品的祭祀空间,而曹魏以后墓室简化为单室,祭祀空间与棺槨则共用一室,祭祀场所偏于墓室的一侧或位于墓门附近,另一侧则放置棺木,这可能也是单室墓内的棺床常偏于墓室侧壁的原因。这样的祭祀空间配置可能存在墓葬等级的差异,一些小型墓葬可能只是砌筑简单的砖台,而大型墓葬常常以帷帐构建一个较正式的祭祀空间,如洛阳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以正始八年墓为代表)、平城北魏司马金龙墓^①、南京六朝墓^②等都常见石质的帷帐座和金属的帷帐支架,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墓则发现了一个完整的祭祀空间,在一个漆木几案上放置着14个漆盘和其他器皿,几案上方曾支着一顶帷帐,帷帐的铜质角管和石座散落于几案上及周围^③。因此,墓室内的祭祀空间是六朝墓葬的普遍现象,用砖台还是用帷帐、几案组合只是墓葬等级的反映,而与地区特征无关。这种祭祀空间可能与墓内设奠有关,曹魏前后地面上的墓祭现象消失后,一部分祭祀活动

可能转入了宗庙,同时也更加重视墓内的祭祀,正如墓碑禁止之后地下的墓志逐渐流行一样。以孝闻名的汉末至晋初重臣王详曾有遗令:“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佩、卫氏玉玦、绶、笏,皆勿以敛。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精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④。王详的墓采用了当时流行的薄葬程序,但并没有省略墓内的祭奠,作为一座单室墓,棺前的床榻就是墓内设奠之所。

在考古报告中一般是根据质地和形态对随葬品进行分类,这在处理史前墓葬资料时或许有助于建立墓葬的年代谱系、讨论墓葬的文化属性,但对年代已不是主要问题的历史时期墓葬而言,这种分类法很容易忽视随葬品的实际意义。丁爱博将六朝墓葬中的随葬品按照功能分为避邪和象征物品、日用器和明器,对我们理解墓葬的文化属性具有积极意义。

丁爱博首先考察了六朝时期两种造型不同的镇墓兽,样式不固定的汉式镇墓兽(有角犀牛形和蹲伏状镇墓兽)、人面狗形镇墓兽,后者最早出现于平城地区的北魏墓葬中,主要流行于北朝的东部地区,并被隋唐墓葬继承,他根据鲜卑、乌桓等北方游牧民族以狗殉葬的习俗,推测这种镇墓兽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解释镇墓兽造型在北朝东、西部的巨大差异:关中地区西魏北周镇墓兽基本上是蹲伏状的镇墓兽,可能就是对本地区汉式传统的继承,东魏北齐则采取了鲜卑式的新式造型。

六朝墓葬中的象征性物品还有玉猪、弩机、堆塑罐(魂瓶)、镜子等,丁爱博通过统计认为玉猪和魂瓶主要是南方地区的特色,弩机是汉代墓葬中的实用器物,但进入西晋后功能发生了变化,东晋以后不再流行,由于石质和银质弩机的存在,而且主要放置在棺内,并不与其他武器放置在一起,丁爱博推测它是一种辟邪物品;根据魂瓶的发现地点,推测它是一种起源于百越的象征物品。这些推测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某些物品象征意义的解释主要依据字面意义就略显牵强,如认为猪即豚,“豚”与“窆”同音,“窆”意指“长夜”,隐喻用于长眠的坟墓,玉豚的使用可能与“窆窆”之“窆”有关;又如认为弩机的“机”代表了发音相近的“吉”,即“吉祥”。

丁爱博对钱币、日用器物及明器的讨论也大量

依据统计数据,比起前述对祭台的统计来说,这里的统计数据更有助于对一些现象做出有意义的阐释,如通过对南北方陶俑数目的统计(北方陶俑多,而且多武装俑,南方陶俑少,而且少见武装俑),分析了造成南北方陶俑差异的原因在于政权结构的不同,认为北方墓俑中由军乐队引导的侍从与武装护卫行列并不仅仅是墓主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武力的展现,旨在宣示统治的合法化,而在南方,这样的武力展示是不合时宜的,南方的社会地位体现在一些更加传统的方面,如对优美的文采和精致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南方墓葬中展示武力的情形仅仅在边境地区的墓葬中有所体现。

《六朝文明》的第七章是“物质文化与艺术”,相当于中国考古学论著中的手工业部分,是对六朝时期陶瓷、青铜器、铁器、镜子、金器、银器、鎏金铜器、玉器、宝石与半宝石、舶来品、玻璃器、漆器的讨论,这些物品大多出自墓葬,但非专为丧葬而作,大多是具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因此,丁爱博主要考察了它们的工艺特征和文化属性,对器物上的图像(如舶来银器和漆器上的图像)也有精彩的论述。

四、六朝的日常生活

《六朝文明》第八至十二章是对六朝日常生活状态的多角度描绘,既有对实物材料中的家具、服饰、武器、乐器的讨论,也有对城乡生活方式、食物、蜡烛、交通方式与娱乐方式的描述。前述有关城市、建筑、墓葬、工艺品等方面的考古实物材料相对比较丰富而且系统,因此基本可以通过实物就能探讨文化传承、交流与传播等问题,而关于此部分内容的实物材料相对稀少,因此丁爱博大量引用保存在各类史籍中的相关资料,如正史、笔记、选集以及文学作品(如赋)等,对六朝的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对家具的讨论中,丁爱博根据考古实物中的家具图像和家具模型,参考《世说新语》、《邺中记》、《颜氏家训》中描绘的家居场景,描述了六朝的室内生活方式,包括与跪坐有关的席、床榻等坐具,凭几、枕头、垫子等支撑具,帷帐、屏风等室内布置,并追溯了折叠椅、筌蹄等坐具在六朝的出现,还对卧室内的家具——箱、柜、筐,以及厨房内的家具——灶进行了描述。

关于服饰的实物资料是相对比较丰富的,丁爱博通过陶俑和壁画资料探讨了不同身份和种族的男女服饰特征,通过随葬的衣物疏讨论了六朝衣物

的材质种类,并探讨了服饰风格的变化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六朝服饰变化的最重要来源是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服饰风格,这种风格逐渐为中原人士普遍接受,最终形成了传统的中原风格与新样式的结合,新的服饰风格非常注重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差异。

六朝时期尽管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年代,但可资研究的武器类实物并不多见,丁爱博以陶俑和壁画中的实物,对照文献对六朝的铠甲、刀剑等进行了讨论,详细讨论了铠甲的制作方法和类型。

关于音乐的遗存在六朝考古中是非常罕见的,乐器一般是非耐用材质制成,除了一些乐器模型外很难保存下来,正如丁爱博所说,音乐是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也成为墓葬内的重要构成,所以在画像石图像中仍保留了一些有关六朝音乐的资料,对照文献还是可以对六朝的音乐生活进行有意义的描述。丁爱博讨论了琴、箏、阮、笛、箫等传统乐器和琵琶、箜篌等外来乐器在六朝的使用情况,也讨论了音乐在宫廷、丧礼、军事等不同场合的使用,探讨了与乐器、音乐有关的文化传播与融合问题,认为中亚文化及佛教文化促使中国传统音乐在六朝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六朝文明》第十二章“日常生活”是对六朝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描绘。首先通过《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等描绘了以洛阳、建康为代表的城市生活画卷,既有洛阳城内的繁华景象,也有建康名士的优雅生活方式,通过《颜氏家训》、《齐民要术》描绘了与城市景象截然不同的乡村生活图景,对南北方粮食和农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加工技术也皆有讨论。

尽管关于灯的实物遗存并不多见,但丁爱博对各种质地灯的造型渊源与功能进行了详细描述,还借助《天工开物》等文献讨论了蜡烛、灯油的制备,讨论了六朝点灯方式在南、北方的差异。有关交通方式的实物资料主要是墓葬图像和模型明器模型中的车、船、骑马、肩舆等内容,这部分重点讨论了六朝时期马车向牛车转变的原因及过程。

最后还讨论了六朝时期的娱乐方式,包括围棋、六博、樗蒲、投壶、格五等游戏,除对有实物资料的围棋、六博作了详细考察外,还利用文献典故对其他几种游戏进行了描述。

上述有关日常生活状态的实物材料非常零散,在一般考古著作中少有系统的讨论,丁爱博充分结合史籍中的典故、轶事,将这些零散的实物连缀起来,完美地复原了一幅生动的六朝城乡生活画卷。

五、六朝的佛教与道教

六朝社会变迁中最重要的方面莫过于佛教的传入,在各个胡、汉政权的推动下,佛教在六朝各地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六朝佛教文明。有关六朝佛教的遗存是相当丰富的,除了石窟寺、寺庙、佛塔等遗迹外,还有大量单体铜、石造像和附属于其他器物上的佛像,丁爱博在第十三章中重点对早期佛像及其传播、铜佛像的铸造和风格演变、造像碑的地区特色等进行了讨论。

除对文献和实物中的六朝佛教材料做出梳理,丁爱博还对一些佛教文化现象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如在考察佛装风格时,认为中国的某些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了外来风格的吸收,多受犍陀罗而不是秣菟罗风格的影响;在考察单体造像的铸造情况时,认为南方因金属短缺而铜器稀少,而北方的东、西部可能也有材质选择上的偏好,东部常以青铜制作发愿像;又讨论了佛教造像碑与儒家传统、丧葬的关系,认为佛教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成功融合以及官僚阶层对佛教的接受,是造像碑得以在六朝盛行的主要原因。丁爱博在这部分的论述详细回顾了学术界对风格与传统等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六朝佛教学术简史。由于道教实物遗存非常稀少,丁爱博仅对一些道教图像进行了综述。

丁爱博的《六朝文明》主要是根据考古实物对六朝文化史的复原,因此是一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代表作。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虽然有文献资料的辅助,但实物资料比史前考古资料更为零散、残缺和片面,如何将实物资料与文献进行有效的结合是历史时期考古学面临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丁爱博虽然没有对方法论的总结,但以对这两方面材料的出色处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对六朝文化的关注对象与谢弗的唐研究内容相仿,但后者主要是根据文献所作的研究,缺乏对实物材料的考察,丁爱博对中文文献的熟悉程度不亚于谢弗,同时对六朝考古材料又有完全的掌握,因此,他对六朝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六朝文明》是一部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著作。

注释:

为叙述方便,本文也以“六朝”代表魏晋南北朝。

Dien, Albert E., ed.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Hong Kong and Stanfor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Dien, Albert E., "Developments in Funerary Practice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Duisuguan 堆塑罐 or 'Figured Jar' as a Case in Point." 载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Six Dynasties Tomb Figurines: A Typology Survey and Analysis." In *Integrated Studie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edited by Tsang Cheng-hua. Symposium Series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No.4 (1997); "The Stirrup and Its Effect on Chinese Military History." *Art Orientalis* 16 (1986);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mor." *Artibus Asiae* 43.1-2 (1981-1982).

Dien, Albert E., "Instructions for the Grave: The Case of Yan Zhitui." *Cahiers d'Extreme-Asie* 8 (1995); "Yen Chih-t'ui (531-591+): A Buddhio-Confucian." 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Schafer, Edward H.,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吴玉贵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齐东方对里、坊的异同、里坊制的形成与形态、特质与影响有详细的论述,参见齐东方:《魏晋隋唐里坊制度——考古学的印证》,《唐研究》(第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德)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类型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考古》1989年第4期。

① a. 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b. 宋鹭:《北魏司马金龙墓葬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02年第11期。

② 阮国林:《谈南京六朝墓葬中的帷帐座》,《文物》1991年第2期。

③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物队:《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文物》1984年第6期。

④ 《晋书·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责任编辑:周广明)